

湖北文史资料

纪念

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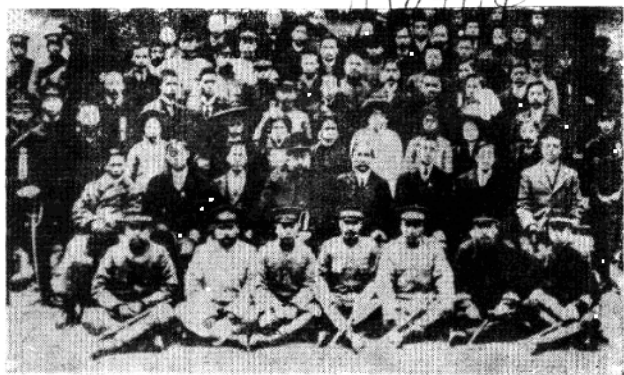
专辑

(总字第十七辑)

一九八六年第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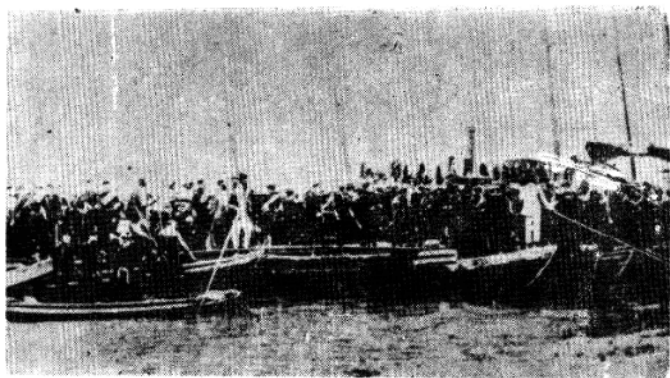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孙中山先生与辛亥首义同志、军政府成员及各界人士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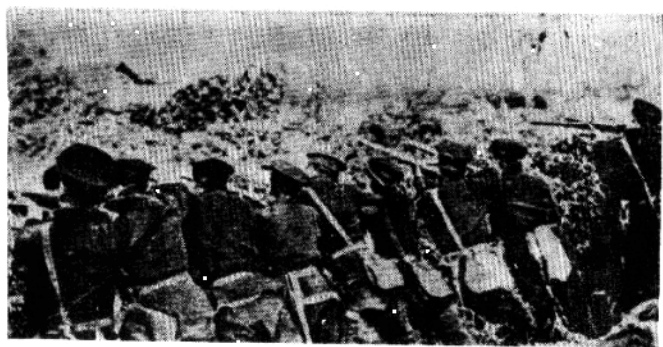


同盟会湖北支部同志欢迎孙中山先生合影





革命军从武昌渡江反攻汉口



革命军在汉口伏击南下的清军



被清军焚烧的汉口街市



孙中山先生与孙武等各界代表 150 人合影 (孙昌芹供稿)

一九一二年二月，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四月应时任副总统兼湖北省都督黎元洪的邀请访问辛亥首义之区——武汉。九日，孙中山先生一行抵达武昌，在前后五天的时间里，遍历三镇。发表演说，并受到各界人士的热列欢迎。这里刊出的是当时的照片，以资纪念。

(封面、插页未注明者均系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提供)



孙中山先生与黎元洪合影



辛亥首义时的武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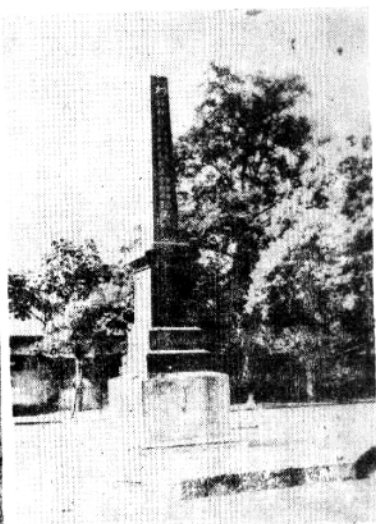
武昌小朝街85号
——党人军事指挥部



彭(楚藩)、刘(复基)、
杨(洪胜)三烈士纪念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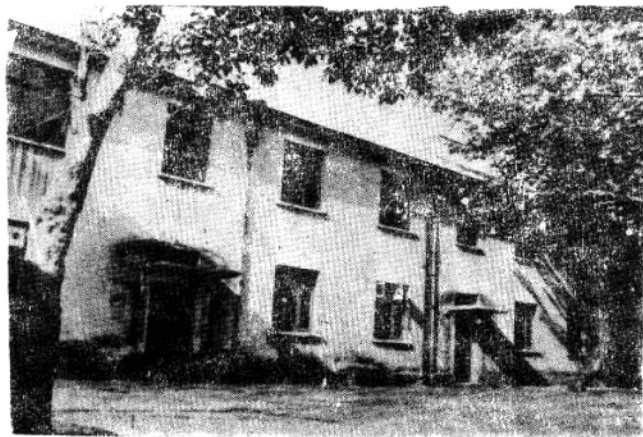
身着战时总司令戎装的黄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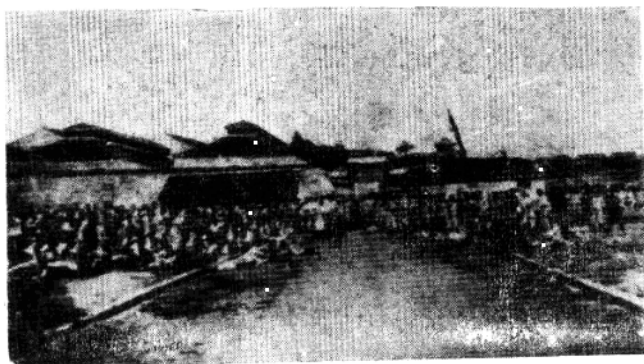
拜将台遗址纪念碑



黄兴与战时总司令部成员李书城、田桐、杨王鹏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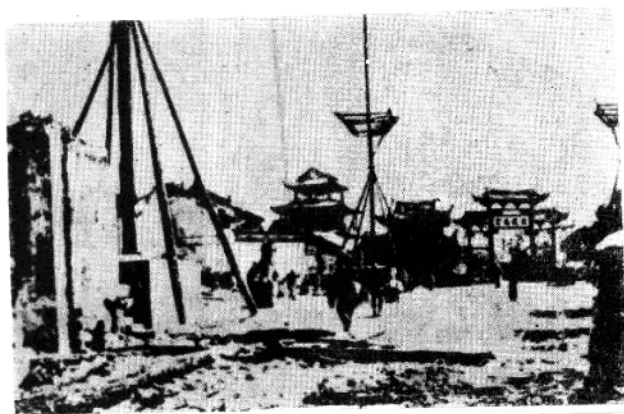


工程八营营房



占领楚望台景况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革命军



革命军攻克后的湖广总督衙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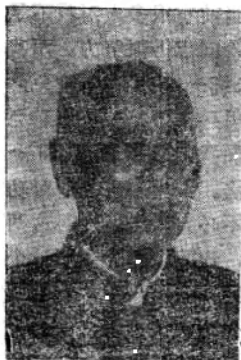
目 录

我和孙中山先生八次会见记·····	喻育之 (1)
先父马君武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事迹·····	马卫之 (9)
忆先父熊秉坤缅怀孙中山先生·····	熊 辉 (13)
记先父程明超追随孙中山先生的经过·····	程 华 (18)
孙中山先生对先父温楚珩关怀备至·····	温联义 温联岐 (20)
 武昌革命之回忆·····	 戴 涛 (21)
武昌首义亲历记·····	徐万年 (28)
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亲历见闻录·····	王保民 (31)
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援鄂记·····	徐源泉 (40)
共进会总机关部是怎样失事的·····	沈畴春 (44)
参加辛亥革命时一个敢死队的经过·····	罗良斌 (46)
辛亥时海军武昌起义回忆·····	朱葆清 (48)
辛亥革命资料拾零·····	朱峙三 (50)
“张振武案”史料十三则·····	罗田县文化馆 (64)
辛亥武昌起义随想·····	岑伟生 (73)
武昌首义前后的两个史实问题·····	傅瑞华 (75)
向芷候、刘彤轩合传·····	张难先 (78)
我所知道的孙武·····	杨 铎 (82)
烈士王汉传·····	王育楚 (89)
忆胡瑛二三事·····	李泰荃 (95)
刘英辛亥革命事略·····	刘文权 (103)
蔡良村先生革命事略·····	卢智泉 蔡晓湘 (109)
外公居正生平简介·····	朱佩珍 朱曼罗 (111) 祁安年 饶天修
先父孙武与吴禄贞前辈交往点滴·····	孙菖芹 (118)

先父邓玉麟主持的“同兴酒楼”	邓锡琼 (120)
先父杨时杰(舒武)在辛亥前后	杨虞夔 (122)
先祖父黄申芑事迹简述	黄 铉 (126)
缅怀先父李西屏	李 柯 (133)
辛亥革命首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	吴锦安 (146)
先父母李春萱、叶岭芳轶事	李永森 (155)
回忆父亲范腾霄	范光华 (157)
祖父余诚、伯祖父余祖言在辛亥革命中	余品安 (164)
忆先父何自新	何小龙 (166)
忆先父宛思演办报	宛斗生 (171)
忆祖父李公长龄	李友三、李颜三 (172)
回忆先父万廷献在辛亥革命前后	万 群 (178)
怀念伯父德瑤公与德琨公	陶洁林 (182)
记父亲蔡汉卿二三事	蔡世骥 (185)
辛亥七十五年祭	曹 璧 (186)
我的父亲容景芳在辛亥反袁中的一个片段	容宗淳 (189)
先祖父徐声金先生传略	徐逢林 (191)
先父胡祖舜在辛亥革命前后	胡济楚 (193)
蔡济民将军和我祖父张祝南	张德庚 (195)
先父郭寄生辛亥点滴	郭星元 (199)
先父徐万年传略	徐仲义 (200)
缅怀先父魏文林	魏顺章 (203)
先父刘玉堂在辛亥首义前后	刘四育 (205)
怀念先父熊持中	熊振校 (208)
先祖父袁礼彬与黄兴先生的一段友谊	袁志诚 (210)
先父曾广大点滴	曾 伟 (211)
纂修民国武昌起义实录启	纂修辛亥起义实录筹备处 (212)
武昌首义大学的筹建与夭折	李修善 (214)

我和孙中山先生八次会见记

喻育之



喻育之近照

我从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到我参加辛亥革命斗争，中间虽然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从事于颠覆前清，恢复中华和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与革命工作，但是和孙中山先生见面还是从日本回国以后的事。回忆我参加辛亥革命以后到孙中山先生北上去世的十四年中，先后和孙中山先生见面共有八次，有的是聆听他的教诲，有的是向他请示革命工作。对于他的耳提面命和谆谆教导，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每当我回忆那些难忘的岁月，精神为之振奋，思想为之开阔，孙先生的音容形象，历历如在眼前。

我第一次和孙中山先生见面是一九一二年四月（即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应副总统兼湖北省都督黎元洪的邀请，从上海来到武汉。这次孙中山先生在武汉逗留了五天，陪同孙中山先生来鄂的胡汉民说：“中山先生这次来鄂有三大感情：一是调查战迹，凭吊忠魂。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筑。三是哀思流离，抚恤疮痍。”五天中向湖北民众团体作了多次讲演，阐述革命的道理。先生到武汉的第二天（四月十日）在武昌黄土坡外语专科学校召见了参加辛亥革命的几十位同

志，牛耀月、庞青臣、喻育之等都在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先生身着长袍马褂，神采奕奕，对在座的辛亥革命首义同志，进行了大约三小时的教诲，对参加辛亥首义同志，倍加赞颂。并说：“民国成立，咸感幸福，推本溯源，都是在座同志们首先光复武汉的功劳。”先生讲述了革命形势，赞扬了首义同志对革命的贡献；还针对我们一部份同志不同意他辞去临时大总统的不安情绪，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当前有很多人对我不了解，以为我功成身退，实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我之所以辞职，乃由形势所起。方今南北尚未统一，战祸在所难免，为了借用袁世凯的力量，推翻满清，则贤于用兵十万。盖可以避免流血，结束战争。因而推荐他继任总统。而我则想和同志们一道，为社会建设，找出一个统一改进的办法。”先生讲到他对功名利禄的看法时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居。”对这两句话，我们大家都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钦佩中山先生不计个人名利的崇高品德。同来的章太炎先生，禁不住用双手拍着大腿叫好。面聆中山先生的讲话以后，对中山先生忠诚谋国，大公无私，献身革命的精神，内心由衷地敬仰。

一九一七年的武汉，已为军阀所盘踞，眼看辛亥革命的果实，被残余军阀所窃夺，推翻了一个满清皇帝，换来了无数军阀的割据，我们革命党人的头颅热血，将会空流，成为泡影。我目睹时艰，在痛心辛亥首义之余，仍然奋不顾身地在武汉继续革命工作。事为武汉军阀头子王占元所获悉，下命令逼缉我，并派人到汉口四官殿德兴衣庄找我大哥喻俊卿要人，要他将我交出。不得已乃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这所大学是孙中山先生和日本友人犬养毅合办的，中国前往留学的学生很多。不久，我被留日同学推选为留日学生会理事，后来为反对“中日防共协定”，为日本当局所不容。一九一八年我从日本留学回国，在上海联合留日同学王兆荣（他是四川人，公费

留日，在帝国大学毕业）曾琦、温立等组织“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王兆荣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同时创办《救国日报》，从事革命理论的传播，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活动。由王兆荣任报社社长，我任副社长，曾琦和温立先后任总编辑。这时留日学生被迫回国的很多，都住在上海，我们以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向各界呼吁捐款资助，以维持留日学生的生活。报社经费除一部分靠资助外，其余则自给自足。我们劝捐的对象很广泛，除爱国人士外，有钱的商人，当时的政府官员，甚至一些反面人物，都为我们捐助，当然也有一毛不拔的，那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愿意解囊相助的。其中捐助最多的是江苏爱国实业家张謇先生，他在江苏南通县创办有我国最早的工业、图书馆、博物馆等，是一位提倡实业救国的爱国家。他还引我们去看过他家住的房子，全部建筑材料，都是用的国货，连做屋的钉子都是国产品，可见他的爱国热忱。

我们办的《救国日报》开始是用油印机印的，后来才购买了机器印刷，先后出版二十七个月，约八百余期，销售最多的地方是南洋，印度尼西亚和武汉。武汉推销《救国日报》的方法别出心裁，几个人抬着一个木架子在街上游动出售，每天报纸，都是抢购一空。我常用阮恒清的笔名发表文章。“阮”是我母亲的姓氏，“恒”是“恨”的谐音，“清”是指清朝，取其痛恨满清之意。报社社址是租用上海法国租界的房屋，以利用法国人势力作掩护。由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军阀的，所以对于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也不能以原则作交易。有一次《救国日报》登载了法国人虐待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派出的华工的消息，遭到法国租界当局的嫉恨，逮捕了总编辑温立，并声言要罚款和封闭我们的报馆来威胁我们。我立即赶往环龙路44号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去向孙中山先生汇报情况。孙中山先生这时正在上海闭门著书，“以学识唤醒社会，”“以古义普及国民。”撰

写《孙文学说》及《实业计划》以七事为证，说明“行易知难”的道理。孙先生博学多闻，手不释卷，在接见我的时候也是一面看书，一面和我谈话。当他听到法国人逮捕了我们的总编辑，要封闭我们的报馆的时候，他很气愤地说：“你们办救国报，为的是救国，救国就要有勇气，就是杀头也不怕。”我并将报社经济困难情况向他汇报，意思是说我们无款可罚。中山先生随即给我三百块钱，嘱咐我：“准备他们罚款。”接着还对我说：“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总编辑马上就会出来的。”第二天温立总编辑果然回来了。以后，中山先生又有几次派人送钱来支持我们。

我第三次会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九一九年。这时《救国日报》的经济来源，一部分是靠给别人刊登广告收费。我们在报纸的中缝位置刊登了一则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推销香烟的广告。有人说，该公司老板简昭南兄弟已经加入日本国籍，该公司生产的香烟是日本货。我们《救国日报》为日本人推销仇货，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事先因为不知道，故有此失，经过调查了解后，此事属实，我们当即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撤版，并在原处换上“痛语”二写，表示对此事的沉痛忏悔。简昭南兄弟见报后，大为惊诧，托人来说十万元情，想挽回这个局面，仍登他们的广告，并愿以两倍的代价来收买我们。当时报社里议论纷纭，意见不一。曾琦等竟然主张将钱收下再说，我坚持不能受贿，坚决不收他的钱，坚决不登他的广告。简昭南兄弟用利诱的办法不能得逞，转而采用威胁的手段来打击我们，他们兄弟请出一个国会议员，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姓名忘记）出面来对我们进行威胁，要我们刊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我为此事特地去报诉孙中山先生，先生一面愤怒地谴责那个大律师的无耻，一面勉励我坚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真理。事后知道那个大律师受到孙中山先生的严厉批评，再也不敢过问此事了。那次我和先生谈话

时，有一位女士坐在先生旁边，出来后，我间接待我的那位负责人，才知道她是孙中山先生的私人英文秘书宋庆龄女士。

一九一九年是孙中山先生为国民革命作出最大决策的一年。这一年的五月，孙中山先生撰写的《孙文学说》又名《心理建设》定稿付印，同时发表《护法宣言》，认为“今日之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之一途。”十月在上海举行的武昌起义八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方法“只有革命。”同时将一九一四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发布规约，规定“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设总理一人，综揽党务，下设党务、总务、财政三部，分别由居正、谢持、廖仲恺担任主任。这时，我以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长的身份，偕同上海一批学生代表、工人代表、商人代表、华工代表去见孙中山先生，向他表达了我们对他无比的崇敬和坚持革命的决心。中山先生当即以“言必信，行必果”这句格言来教导我们，大家深受启发，这是我第四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我第五次会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中山先生被迫离开广州，避赴上海的时候。在这以前，上海留日学生救国团等七个团体联合通电，痛斥徐世昌身兼帝制，复辟、内乱、卖国、僭窃五罪，历举应推倒之理由八条。全国各界通电广州政府，请求北伐。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不图陈炯明部四千余人围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先生观音山住所粤秀楼。中山先生避居宝璧舰，后转永丰舰赴上海。电令北伐军回师东征，讨平陈炯明叛变。其时我的同乡何成浚在福建任北伐军师长，邀我去福建任该师军法处长。我著有《军人之友》一书，在北伐军中，作士兵教材广为宣传。陈炯明叛乱平息后，革命军誓师北伐。我因不习惯于军队生活，由福建泉州仍到上海从事于革命活动。这时孙中山先生为了壮大北伐的武装力量，派我的同乡黄陂人潘正道去四川策动刘湘出师北伐。刘湘任潘正道为师长，

每人月给二十元薪俸，筹组部队。我在上海去见孙中山先生时，先生任命潘正道为鄂西革命军总司令，要我任潘正道的驻沪联络员，并将他给潘正道的手令要我去四川转交，还要我口头对潘正道说：“鄂西总司令，并不限于鄂西，可向川东一带伸展，策动川军出川，配合北伐。”同我一道去重庆的有潘汉臣、王季侯、李华三和董必武同志的弟弟(名字忘记)。另一方面由董必武同志联系派去四川的共产党员杨经曲(武昌人)，也是到四川去做策动刘湘出川北伐的工作的。我们国民党的这一班人到重庆后，创办了《重庆时报》，旨在宣传革命，唤醒群众，报社由我负责。共产党也在重庆办了个《新蜀报》，由肖楚女负责。我为《重庆时报》出版第一篇社论，就是以“鼓吹革命，不涉党争”为题，表示与共产党合作。湖北应城人蒋作宾是学军事的，送了我一本万分之一中国地图。《重庆时报》所登载的北伐军的胜利消息，所到之处，几乎连一个小地方都有，都是根据那本地图查到的。因而报纸很受欢迎，销路很广。

我第六次会见孙中山先生，主要是介绍施洋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二年，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该会拥有武汉工团联合会的二十八个工会，声势浩大。施洋为维护工人利益，曾与湖北军阀作过尖锐斗争，在这以前，全国各界联合会在武汉开会时，由施洋担任大会主席，决议将张敬尧祸湘，陈树藩祸陕，倪嗣冲祸皖的种种罪行通告全国，一致声讨。因而，施洋的声誉遍及全国，成为全国的著名人物。孙中山先生早有听闻，而施洋对孙中山先生也很仰慕。那年施洋到上海参加全国法学会议，住在我家里，经常和我谈论国家大事，表示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之忱，意欲一见孙中山先生。有一天我陪他一同去见中山先生，交谈中，先生对施洋在汉口领导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备加称赞，认为他有胆有识，在革命阵营中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意见，

经李大钊与孙中山先生谈判，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接着，由孙中山先生主盟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同时加入国民党的还有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以后又有很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当时我虽然不知道施洋究竟是不是共产党，我想即使是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也是可以的。因而，我向孙中山先生提出介绍施洋参加国民党的意见，中山先生欣然同意，施洋当面宣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幸的是他在第二年“二七”大罢工的斗争中，牺牲在军阀的屠刀之下。当他的遗体安葬在武昌洪山之麓的时候，我为他书写“施洋烈士之墓”的碑石，以志我的哀思。

我第七次和孙中山先生见面是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军阀段祺瑞进行南北统一的和平谈判。中山先生决定北上前，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负责大本营事务，驻守韶关，主持北伐军事。孙中山先生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主张，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离粤北上，抵达上海时，受到万余群众的欢迎。这时我已知先生患有肝病，立即赶到上海去晋见孙中山先生，劝他以健康为重，暂缓此行。先生对我讲了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语重心长地说：“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革命党人是从不考虑个人安危的。”显然，我的劝阻没有被先生所采纳，反为先生的教诲所说服，然而我总还是在为先生的健康而忧虑的。

我第八次会见孙中山先生，是在第七次见到先生以后不久。我又和当时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几位同志去劝阻孙中山先生缓期北上。孙先生除了叫我们不要为他的健康耽心而外，还告诫我们说：“国家一天不统一，革命就不算成功。”同时谈到段祺瑞邀请国民党人参加他筹备召开的所谓善后会议，实质是个帝制复辟的会议，国民党人决不参加他的这个会议。我们是针锋相对地召

开国民会议，商讨南北和平统一的办法。他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中国要统一，首先非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可。”这是我最后一次会见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为国事奔走，不顾安危毅然北上了，抵达天津后，肝病发作，仍然扶病入京，到北京时受到十万人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在车站发表书面谈话指出：“中国人之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我们必须要救国，要救国就要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的《遗嘱》里提到的“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伟大号召，掷地有声，发人深思。先生一生为国民革命谋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和平统一，独立自强的救国精神，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回忆我八次面聆孙中山先生教诲的情景，仿佛孙先生的伟大形象，就在眼前。先生的一切至理铭言，真是令人终生难忘。而先生没有完成的遗愿，早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

（胡起祥整理）